

重点推荐

# 这些外国人用中文写作也开阔了中国读者的阅读

不管使用什么语言,更开阔地了解世界、记录世界,是写作的根本,也是文化传播交流的根本。

## 意大利作者用中文写出《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在读者选择下,《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成为豆瓣网2024年度外国文学(非小说类)排名第一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本书虽然被归类于“外国文学”,却没有翻译,而是一位年轻意大利作者用原汁原味的中文写的作品。

2016年,23岁的亚历在大学毕业以后,“有幸成为每5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传媒专业出身的他,怀揣着“世界公民”的理想,因为大学时参加南京青奥会报道的经历,作出了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的决定。他先是从零开始学中文,然后逐步接触中国的影视业:参与纪录片的翻译,参加广告片的拍摄,跟随剧组在主旋律电影中当一名群众演员……“回老家的时候,高中同学说我讲的是中式意大利语,带音调的。”亚历在中国的学习成果非常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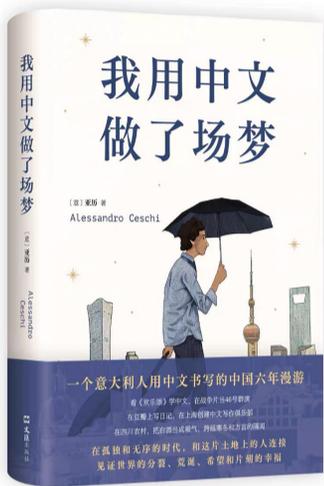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外国人,亚历并不否认自己在中国生活拥有的某些优势。比如,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份外教工作,于他来说,语言机构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再比如,很多电视剧、广告片都需要外国面孔的群众演员,但“对职业发展没什么价值”。这些优势,加上普通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整体善意,都帮助来到中国的他更好地生活。

与此同时,亚历也表达了外国人更深层次的融入难题。比如,当大量外国人在北方小县城拍电影时引发当地居民的“疑问”,在旅行时面临旅馆能否接待外宾的问题。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种种不便,有的需要时间逐步改变,有的则正在得到改善。2024年5月,有关部门就答复称,旅馆业不得以无涉外资质为由拒绝接待境外人员,将指导监督旅馆业进一步改进涉外接待服务能力。

然而,亚历并不认同“非常刻意地去强调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中,既有对饭局的观察,也有在青年旅舍住宿的经历,还包括“在车站餐厅吃了顿16元无限加菜的午饭”的体验——这些场景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些中国作者的笔下。亚历还用调侃的语言记录了多国群演为了获得露脸机会,开展各种有意无意的竞争——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是“用母语思维去做翻译”。

## 中文也是国际化的语言 促进文化交流、开阔视野

外国人到中国旅行和生活,留下对中国社会的记录并不少见。不过,能够用中文进行写作并出版,更直接地面向中国读者分享自己的观察,总体而言仍属凤毛麟角。大概是因为汉语和日语的相近性,用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相对较多。而且,区别于西方作者不可避免的“文化震惊”,作为同属东方文化的写作者,日本的中文写作者能够更加深入中国社会。20世纪



80年代到中国留学的新井一二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井一二三文集”已有15册。其中,既有作者在中国的旅行记录,也有她作为日本人向中国读者介绍的日本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不吝赞美之词:“不是自己的母语而能达到如此造诣,令人钦佩!”

近年来,随着汉语影响力的扩大,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作者群体显著扩大。日本作家吉井忍与新井一二三有着类似的留学经历,2023年年初出版的《东京八平米》可以称得上畅销。这本书介绍了作者在8平方米房间里的日常生活,也记录了在东京生活遇到的人和风景。作为中国人出境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不少中国游客也把这本书当成个性化探索东京的指南书。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当我们为外国人学习中文感到自豪时,也应当意识到中文本身就是国际化的语言。比如,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作家而言,中文是他们的母语,自然要使用中文进行创作。比如,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黄锦树的《雨》、张贵兴的《野猪渡河》等作品,拿来与中国一流作家比较,也并无逊色之处。

“我之所以会有底气用中文写作,是因为我发现我会用中文讲话。”作为一个从10岁起就开始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文青,亚历在总结自己的中文写作经验时,认为“幽默不一定是和哪一种语言有关,可能更多的是你看事情,甚至看世界的方式”。

外国作家用中文而不是母语写中国,究竟有何不同?除了减少了翻译所导致的信息损耗,更重要的是,掌握用中文写作的能力,意味着作者能够更透彻地理解中国社会,既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用平视的视角观察中国。这些能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人,在呈现中国社会时也不再是出于猎奇视角,而是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

这些作品的出版,也丰富着中国文化、促进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他们站在外部视角,出于善意地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实际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他们更全面地呈现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洞察,也开阔了中国读者的认知,甚至对中文写作的整体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

书香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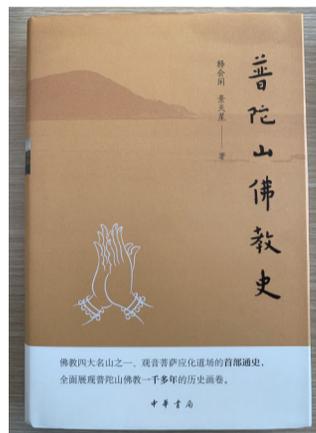
## 守正与创新的完满融合 ——读《普陀山佛教史》

□界定

普陀洛迦自唐咸通四年(863年)开山以来,迄今已千年有余。此千年之中,若欲对山中人、事、物、景给予详略记述者,莫过于撰写诗文或编纂《山志》。从目前资料来看,有关普陀山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而普陀山最早的《山志》当属元人盛熙明的《补陀洛迦山传》。此后《山志》编撰历代皆兴,连绵不绝。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普陀历代山志竟有二十余种之多,可谓蔚为壮观。然迄今为止,从史学层面对普陀山僧僧二界进行综合撰述者,却近于无,实为大憾。

然而,《普陀山佛教史》的问世,使这一大憾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早在2016年,身为普陀山佛协副会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会闲法师即发心撰写《普陀山佛教史》(与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景天星合作)。作者历经八年,数易其稿,大愿遂成,并于2024年5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普陀山佛教史》的出版问世,不仅填补了普陀山史学领域的研究空白,更是实现了普陀山僧俗二界长久以来的夙愿,可谓功德圆满,法喜增上。

纵观《普陀山佛教史》,除了《绪论》部分对全书进行综述以外,该书的其余章节以朝代更迭为线索,共分为六章,分别为“佛教的传入与普陀山开山”、“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普陀山佛教”,从宏观层面对普陀山佛教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高僧、建筑、人文、教况、法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在本书第一章中,除了对佛教传入浙江及普陀山开山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外,还对佛经记载与东亚海洋航行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力地佐证了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可或缺性。在谈到“宋代普陀山佛教”时,除了谈及普陀山佛教的宗派、宗风以外,还重点谈及宋代普陀山佛教寺院的“易律为禅”,此恰为宋代普陀山佛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元代普陀山佛教”一章中,一方面论及蒙元时期的政教关系及汉藏佛教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还论述了普陀山教界僧人在元代对外交往中所发挥的纽带作用,可谓角度新颖,观点独到。在明、清及民国普陀山佛教三章中,作者重点谈到了朝廷的海疆政策对普陀山佛教的巨大影响,



同时也谈到了普陀山佛教神圣空间的形成与全面构建,最终使普陀山跻身于“四大佛教名山”之列,使海天佛国、观音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观音文化全面融入中国元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若从学术角度来看,《普陀山佛教史》无疑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价值。诚如本书在《绪论》第四节中所说,本书有三大研究意义及三大创新点,尤其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体系方面的创新,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普陀山佛教的其他相关领域(诸如发展史、教制史、信仰史、建筑史、人文史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独特思路。而这种创新无疑是建立在尊重史实、遵循佛教传统的基础之上,如对已知文献的把握解读与分析运用,以及将普陀山佛教放在中国佛教及东南亚佛教的视野高度去审视,便会发现:普陀山佛教并非孤立地存在与发展,而是与整个中国佛教乃至华夏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佐证了“国兴则教兴”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历史铁律。从这个高度来看,《普陀山佛教史》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及卓越的前瞻意识,则是毋庸置疑的。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普陀山佛教史》的问世,为当今乃至后世进一步研究与普陀山有关的史学著述,树立了样板,提供了便利。随着祖国的日新月异以及普陀山佛教事业的蒸蒸日上,笔者坚信,未来普陀山佛教的断代史和《普陀山现代佛教史》也将会陆续面世。相信在会闲法师的引领下,在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普陀山佛教文化事业一定会迈上更高的台阶。